

阿尔及利亚以及苏丹。有人觉得，这是那些“老动乱国家”经历多年战乱后精疲力竭，人心思定，这种说法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2020年，埃及等经历“第一波冲击”的国家里，要求获得就业以及电力、水、教育和医疗等体面的公共服务的大批普通民众依然纷纷走上街头。

在中东，不满的根源主要是缺乏经济机会。1999年，一名年轻的黎巴嫩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在，他有可能得不到。多年来，阿拉伯青年向欧洲迁徙，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及汇款形式的收入来源，但随着欧洲对叙利亚战争难民越来越不容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针对生活无望的抗议浪潮，2018年底首先在阿尔及利亚开始，当时布特弗利卡总统誓言竞选第五个任期，结果失业的年轻人喊出了“只有香奈儿才有五号”的揶揄口号。仅仅几周后，由于一名将军被解职，伊拉克抗议者加入了这场冲突，到了2019年10月，黎巴嫩人也上街游行，原因是当权的萨阿德·哈里里政府增收乏术，为应对即将到期的债务，决定对互联网用户征税，特别是对WhatsApp电话征收新税，顿时点燃了火药桶。

在2020年，中东示威运动出现更多系统性改变的目标口号，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高级人物下台，特别是禁止前政权领导层在国家过渡时期发挥作用。贝鲁特大爆炸后，黎巴嫩的抗议者说：“他们（政府）所有人指的就是他们所有人。”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卡尔达斯说：“这不是针对总理或总统的示威，这是一场要

求整个统治阶级下台的抗争。”

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抗议活动正在迫使政府作出改变。在拥有石油财富的政治势力面前，抗议活动仍显得底气不足，最典型的是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已经辞职，但他所处的政府和所参与的体制仍然牢牢掌权。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维特斯说：“这是需要一代人去解决的问题。又一代阿拉伯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与世界有更多联系——正在走向互联网。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作主。他们想要作出选择。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迫切要求政治和社会变革。”

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更担忧的是，除开影响稳定的新因素，造成“阿拉伯之春”的旧问题仍然时时发作，特别是没有改变的错误农业政策更给中东国家稳定埋下“定时炸弹”。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新冠疫情肆虐，2020年的全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中东主要人口大国纷纷出现贸易逆差失控，而糟糕的农业政策尤其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导致了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丧失土地，许多人被逼到准备打仗的地步。眼下，埃及粮食状况危急，该国现有够两到四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供给，但它其实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在这个国家，40%的成人因粗劣的饮食而影响身体发育。而在叙利亚，先是政府稀少的水资源错误地导向小麦和棉花灌溉，以追求自给自足，接着战乱中，地方割据势力滥用水资源去开采石油天然气，非法水井让地下水位大幅降低，300万叙利亚农民（该国总共有2000万人口）成为贫民，数十万农民离开农庄，住到各城市

郊区的帐篷营地。经济学家保罗·里夫林在为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不少阿拉伯国家存在“因管理不善被毁的风险”。

重视四个方面

尽管中东历史上从来不乏地区战争、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但当前动荡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这一年，中东整体政治形势仍未出现好转迹象，战乱地区局势甚至更加恶化、混乱、恐怖，中东仍是全球最动荡、最危险、最复杂的地缘板块。

历史上，中东各国曾尝试过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多条发展道路，但始终未找准对症“药方”。“阿拉伯之春”大潮过后，证明最新一轮中东政治尝试再次失败，各国、各派、各阶层仍在政治苦闷之中，找不到可靠的政治出路。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其“民主转型”一度是中东政治转型的唯一“成果”，可突尼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政治哲学博士米兹里·哈达德却强调，同媒体神话般的表述相反，在社会现实上，面对呼喊饥饿的人民，突尼斯奉上的“民主”这道汤里没有面包、住房、工作等等“主观权利”，而这些恰恰是社会动乱的主要诉求。

“突尼斯此前是世俗化的、安全的、宽容的国家，而它现在却变得社会失范、宗教原教旨主义、安全脆弱、经济一片废墟，我们能说的就是突尼斯出现‘大规模倒退’”。